

編後語

經過了一甲子的風風雨雨，新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考察大國的興起，內政與外交是相互關聯的兩個獨立領域。本刊上一期從法治、經濟、政治、少數民族政策、意識形態與大眾文化等多元視角，集中討論了中國內政在過去六十年的變遷。這一期側重於新中國的外交。

本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選刊了四篇文章，從完全不同的視角探求中國崛起所涉及的諸多外交困惑。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就是致力於維護一個有利於現代化發展的國際環境。在策略上，中國抱持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取向，擁抱全球化和區域化，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努力在國際上建立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在鄭宇碩的描述中，這一策略在中共十七大之後得到了更為清晰的體現和全方位的發展；然而，儘管中國領導層小心翼翼地努力避免衝突，但是國際上對中國的疑慮、抗拒、批評之聲依然不絕於耳。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外交政策是所謂「國家自主性」最強的公共政策領域之一，即政策的形成過程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精英所主宰。這一點在極權主義或威權主義政治體制中尤為突出。薛力指出，中國對東南亞外交在過去六十年的劇烈變化，可以從國家身份認同的不斷變遷來理解。以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為界，中國的國家身份從帶有國際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國家轉變為帶有地區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國家，由此，中國對東南亞的外交也從國際體系的革命者轉變為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在擁抱地區主義和全球化之後，中國外交政策的可預見性將大大增強。

大國的標誌不僅在於其硬力量，更在於其軟力量，包括制度吸引力、意識形態感召力、社會凝聚力、對外文化影響力和國際責任擔當力。丁偉指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軟力量儘管也在不斷上升，但卻沒有同其硬力量同步發展。中國固然在軟力量的國際化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例如在世界各地興辦孔子學院，但是如何在制度、文化和社會凝聚力的基本面上加以改進，依然是一項「艱巨而又刻不容緩的工作」。值得慶幸的是，中國擁有獨一無二的香港，一個東西方文化融會的國際大都會。洪清田提示我們，如何正視香港在推展中國的「人文外交」尤其是壯大軟力量中的積極作用，是值得思考的一個新課題。

儘管外交政策具有某種「自主性」，但是它與內政的關聯實際上異常密切。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發展主義都是中國現階段發展的主軸。發展成為硬道理自然是不錯的，然而如何尋求發展以及如何正視發展中面臨的問題，理應成為發展主義的核心內涵。姚新勇揭示，中國族群衝突的激化並不能完全歸因於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暴力恐怖勢力的干預，更為重要的是片面的發展主義引發了諸多少數民族政策的失效和失誤。馬得勇告訴我們，各界精英在重建社會信任、促進社會和諧、推動社會發展上承擔着無可推卸的責任。